

手工针脚里的传奇在这里续写

红帮文化艺术馆近距离还原最具年代感的“红帮与北京”

■通讯员王国海

宁波“拎包裁缝”外出谋生，成名于上海，而后蜚声海外。

当年，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为外国人做衣服的裁缝就被称为“红帮裁缝”。“红帮”之名由此而来。

见证重要历史的珍贵展品悉数亮相

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红帮文化艺术馆300平方米的展厅里，关于“红帮与北京”的展览正在进行，展览将持续到12月15日，展品71件，其中近30件服装。众多与红帮裁缝相关的珍贵物品悉数亮相，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所穿过的中山装复制品，民国造寸牌女大衣、荣昌祥牌大衣、培罗蒙牌大衣等，还展出了红帮裁缝各类服装工具铜熨斗、老式缝纫机，近距离还原最具年代感的红帮与北京。

“这个布馒头是做什么用的？”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红帮文化研究所所长冯盈之教授给现场的参观者解答，布馒头一般用白粗布作面料，里面充入木屑或黄沙，垫烫服装的胸部和臀部等丰满处，可使服装的造型更为饱满。“你们仔细看，因为形状很像食用的馒头而得名。”随着服装业的发展，布馒头被其他工具所替代。冯盈之说。

另外，邓小平赠送红帮裁缝王庭森的果篮、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王庭森的围巾等珍贵藏品也在展馆中央展台展出。

“当年上海西服业鼎盛，企业众多。因为国家需要，20余家上海红帮名店迁移进北京，后面并为红都时装公司。这家公司位于天安门旁，也是天安门旁的唯一一家企业。”冯盈之告诉笔者，以前去红都做衣服都是要介绍信的。鼎盛时期的上海红帮裁缝有60%的师傅来自宁波，红帮进京后，在款式、面料、工艺方面又进行了大胆创新。

第一件中山装就出自红帮裁缝之手

《西服裁剪指南》，是中国第一本西服专著，也是一本专用教材，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印有“裁剪学院监制”字样的直尺，是中国第一家西服学校定制的裁缝直尺……

类似这样的第一，红帮裁缝创造出很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件中山装就是出自红帮裁缝之手。

这件展品是1:1仿制，能让人联想起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中山装的设计包含了孙中山先生的许多治国理念。根据当时中山先生的想法，设计师在中华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优点，精心制作出一套既有民族色彩又富时代感的制服。”冯盈之指着中山装解释，胸前口袋的袋盖为笔架形，寓意以文治国，后背没有破缝，强调的是国家统一，而袖口上的三颗扣子，寓意三民主义。

“中山装经试穿后，广受好评，很快流行起来。民国乃至新中国后，成为男子的标志性服装。”冯盈之说，红帮作为中国近现代服装改革先驱，结束了中国穿长袍马褂的历史。

红帮文化艺术馆里有一张邓颖超制衣订单，非常特别，纸上仍然可见：“中南海”、“1976年8月30日”等字样，并详细备注了衣服数量、样式、取衣时间。

“这本笔记本是王庭森当年做服装的记录本，很有意义。”冯盈之介绍，本子里记录了邓小平、李先念等30多位国家领导人服装的尺寸、布料、颜色等，是红帮裁缝见证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历史资料。

红帮文化走进高校

目前，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积极与宁波当地知名的服装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同时，也积极邀请红帮第六代传承人江继明来校任教，以陈尚斌为代表的第七代传人也在毕业后留校。

冯盈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位老师的学生都是红帮弟子，意味着红帮精神在学校得到延续和传承。

据了解，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已将红帮文化确立为校园文化之一。自2001年第一个红帮文化研究所成立算起，已经有16个年头了。2010年，学校正式推出红帮文化课，向学生讲授红帮的精神品质和文化精髓。另外，学校还建设了红帮文化长廊，并把学校主教学楼命名为红帮楼。

在红帮文化艺术馆展览入口处，桌上摆着关于红帮文化研究的刊物和书籍，供学生们阅读。冯盈之拿起《红帮文化通论》介绍：“这本《红帮文化通论》是学院的特色教材。这本《红帮裁缝评传》入选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之窗项目。《季学源红帮研究文存》被剑桥图书馆收藏。这些书为构建学校特色校园文化奠定了厚实的学术基础。”



红帮服装研究所所长冯盈之在介绍中山装的历史。

20年的断层横亘在设计师与手艺人面前，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亲力亲为，捡拾中国正在消失的手艺，用自己的言和行告诉人们——

好的器物，用100年也不会厌

■记者许瑞英

30岁的王猛涛是绍兴新昌人，“自然造物”的总监、设计师，还是一个刚入门不久的打铁匠。

与他会面的地点就在其位于杭州小河路运河天地的办公楼里。这是一栋三层小楼。虽至初冬，整栋建筑还是掩映在一片茂密植被中，呈现清幽之态。

推开高高的木门，偌大的空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竹制、木制、铁艺、陶艺等器物。这是“自然造物”这些年来做过的产品。空间很大，办公室颇有些清冷，但在记者到来之前，王猛涛早已生好了炭火，挂在炭火上的铁质茶壶正滋滋冒着水汽。炭火的炙热，让茶桌上随意放置着的清冷铁质茶具，也渐渐有了暖意。



王猛涛，很享受打铁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

为了心中的那个理想，他放弃了在重点大学的学业

王猛涛，瘦高个，戴着黑框眼镜，长胡子，长头发。初见，很容易被他周身纯净的艺术气息所感染。长谈，发现这个说话声音低沉、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的王猛涛却是个很有故事的人，比如，因为坚持自己的理想，放弃了当初重点大学土木工程的学业，是个在大二就退了学的“叛逆青年”。

“我开过设计公司，但没几个月就倒闭了，后来打工做设计师，还在苏州经营过酒吧，开过咖啡馆。时常熬夜、喝酒。那几年，我觉得自己快变成一个混混了。”直到2013年，他卖掉了所有的店，骑着摩托车来到杭州，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了团队，“才找了一条正确的

路，那就是‘自然造物’。”

“自然造物”成立以后，团队围绕着自然、人文、手艺这三大核心元素，走村串户，通过一人一事一物的方式，互联互通，把中国各地各民族原生态农产品、传统文化和传统手艺进行再现、再造、再生，希望用行走的力量，去捡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手艺。其

铁匠铺的消失，似乎带走了某种精神

2014年，“自然造物”和杭州一所大学联合发起了一场“大学生回家乡发现传统民艺”的毕业创作活动。在当时一个学生的作品里，王猛涛偶然看到了一套手工锻打的剪刀。

王猛涛说自己真的好久好久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剪刀了，当时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把剪刀，居然是人的双手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王猛涛如获至宝。

“铁器是这样一种器物，它的气质足够安静内敛，却又让人肃然起敬。当用手去触摸它表面肌理的时候，仿佛能看见时间。”这燃起了王猛涛想亲眼见证黑铁在匠人日夜不停地敲打下，和不息的炉火淬炼之后最终成为一把剪刀的冲动。于是，他跟学生要了师傅的联系方式，就上路出发了。

在浙江慈溪新浦镇一条不起眼的街边上，他找到了铁匠胡国庆师傅。

镇上人都叫他阿庆，打剪刀打了二十几年。王猛涛至今还记得

初见阿庆时的画面：戴着眼镜，嘴上叼一根烟。站在那儿，打铁的叮叮咚咚声，会和炉子里炭火嘶啦的声音混在一起。那节奏有一种奇妙的美感。

“以前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有铁匠铺，大人们用的农具、家里的门把手、炒菜用的锅，都需要铁匠打出来，所以那时候铁匠师傅的手艺很清香。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打铁’两个字好像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家里的所有工具开始变得越来越新，更换的频率也越来越快，什么东西坏了破了，想当然的就是再买一个。”

在王猛涛看来，铁匠铺的消失，似乎也带走了人们生活中的某种精神，那种凡事修修补补、珍而重之的精神。

“我们似乎忘了，菜刀和剪子用钝了是可以磨的，所有工具都是应该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去打制的，对器物的感情是应该去守护一辈子的，有

些事情遗忘之后剩下的只是无节制地将就和丢弃。”

在离开阿庆师傅的时候，王猛涛问起阿庆师傅怎么看这门手艺的将来，阿庆师傅摇着头说：“等到我老了做不动了也就算了。倒下了，就没人了。”

没了需求，没了尊重，也不赚钱，还有必要几十年如一日的寂寞与坚持吗？如此看来，似乎打铁匠后继无人也无可厚非了。这几年寻访各地的手艺人，王猛涛见过太多类似阿庆的故事。

最开始的时候，王猛涛也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譬如说打铁，虽然他很喜欢那些精致的铁器，但总不可能自己去建个大炉子，然后拿起几斤十斤的大锤子去打一把很难派上用场的锄头吧？这太不实际了。

直到有一天，他到景德镇去拜访一个做柴烧的朋友，在他的茶桌上看到了一把铁质的茶匙。

“它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散

间，王猛涛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越来越意识到传统手工艺的发展隐忧。

譬如说打铁。

“铁，在我国古老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渐渐听不到打铁的声音，连铁匠这个称呼、打铁这门手艺，也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记得了。”

发着一种古朴与静谧。缓过神来我跟朋友问起它的来历，他说他之前从老家具上拆下了几枚钉子，丢了觉得可惜，就拿茶炉烧炭，将钉子烧红后反复锤打，耗半日光阴即可。我知道打铁厉害，但不知道它还能做到这样的化腐朽为神奇。”

回到杭州之后，王猛涛立刻着手操办了一堆家伙：一个炉子，一箱炭，还有老钉子。找了个阳光不错的午后，起个炉子，点根烟，当半包烟空了的时候，他人生中第一个铁器作品问世了。

“打铁的过程给我的感觉就像旅行坐火车，呆呆地等着铁在炉子里慢慢变红。这个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够我思考一些平时不会去思考的问题。当最后东西成型放入水里淬火的瞬间，就像一只脚踏上了陌生城市的土地，中间固然有旅途的疲惫，但更多的是放下一些东西后的轻松。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想念那些打了一辈子铁的老铁匠，日复一日虔诚地敲打着心里的那只木鱼，不知完成了多少人世间的修行。”

“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师傅们为改变所做的付出，和彼此间的那种默契和信任。在我看来，所谓匠心，就是遵循一种规则，在这种规则的指引下，再运用智慧，付诸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东西。”

历经近4年时间的摸索和磨合，他们制作的第一批铁制茶器成功实现了小规模量产，从杯托到茶勺、茶则等器具，一应俱全。产品得到圈内人士认可的同时，来自台湾、日本等地的客商也发来了订单，这让他和铁匠师傅们欣喜不已。

舒适，更有幸福感。”

这个对工作有着钢铁一般韧性的男人，在生活中却也可以幻化成柔指柔，他告诉记者，自己经常带着爱人和2岁的女儿一起出差，他觉得陪伴才是最恰当的表达爱的方式，工作和家庭，就好比器物之于生活，好的器物，用100年也不会厌，和谐、舒适才是最完美的存在。



王猛涛的铁艺。

如何让师傅们恢复生产力

王猛涛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让老师傅们恢复生产力，如何让铁器可以再一次真正进入大众生活。

从慈溪到松阳，再从杭州到景德镇，带着设计师和学生，王猛涛和团队调查走访了十余家还在经营的铁匠铺，希望能通过设计师产品的开发，来尝试让这门技艺重新走向市场。

但最开始的时候很困难，找不到现成的设计师和师傅愿意做。

“因为大部分设计师对打铁工艺了解几乎为零，而老铁匠又往往无法理解设计师的设计思路。不要说碰出成熟的产品，连正常的沟通都成问题。20年的断层横亘在设计师与手艺人面前，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后来，王猛涛索性自己画设计图，自己去找各种师傅讨教。

“但这不够呀，我们必须解决的是，是如何让师傅们恢复生产力、

重新建立完整供应链的问题。只有这样，铁器才可以真正进入大众生活，而不是价格昂贵的艺术品。所以，我必须把我在这两年学到的东西回过头再教给师傅们，让我理解构思的作品得到师傅们几十年手艺的支撑。”

终于，一群互不相识的天南地北的两代人，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用师傅们技术纯熟的双手，打出了年轻人想要的设计。

有了成功的案例之后，“自然造物”又持续关注了许多其他手工艺，如，铜器、陶艺、竹器、造纸、方巾……

王猛涛说，4年时间，他和小伙伴们跟打了鸡血一样去探访那些与乡村、民艺、手艺人有关的一切。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就要待上几个月，在大山里跟村民们同出同进。他们用脚步去发现、用镜头去记录、用设计去再造中国传统手工艺之美。

为了更好地去记录民艺，王猛涛逼着自己去学做纪录片的导演、拍摄、剪辑等，几年来竟然完成了约100部纪录片的制作。

“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民艺复兴之路，从田野调查到拍摄制作纪录片，从产品制作到年节复兴计划，我们所

做的每一次尝试都希望能够带动一部分民艺的复兴。”

虽然，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但，王猛涛仍然觉得自己选择了一份正确的工作。

尽管公司成立以后，好多次都被房租、人员成本等巨大的开销弄得狼狈，几个合伙人甚至都把自己的房产抵押来维系公司的运营。直到去年年底，公司运营才算步入正轨。今年上半年，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们获得了一家厦门传媒公司的资金注入，今年更是与政府合作，接下了投资亿元的景宁畲乡古城改造项目。

王猛涛说，其实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铁艺、染织、服装等传统手

工艺都非常喜欢也很关注，也想去学习，但苦于没有信息和好的平台。未来，“自然造物”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多建立一些这样的平台，让更多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体验。

此外，“自然造物”还要建立起更为详尽的手艺人库并共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哪些地方还有哪些人，他们做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美在什么地方。他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感染更多人，让越来越多行将消逝的手工艺重新在生活中呈现出来。

当周围的一切和内心意识开始有越来越多共鸣的时候，设计变得随心所欲：“当工作和生活都回归到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以后，我发现很容易找到自己心中的设计，生活也变得更为